

多元视角与多重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共空间

——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中心

戴一峰

摘要: 公园作为近代中国城市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近年来引起一批学者的浓厚兴趣,问世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者揭示了中国近代城市公园萌生与演化的历史进程、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文化内涵、多重功能及其象征意义。这些成果既显示至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显示了有待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一是对不同城市公共空间的比较研究;二是关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倡议者和设计者;三是探索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四是处理好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号: K92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1)06-0134-08

作者简介: 戴一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福建 厦门 361005)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城市公园是城市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作为近代中国城市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一道特殊的人文景观,近年来,近代公园引起一批学者的浓厚兴趣,问世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者挖掘、爬梳各种文献资料,揭示中国近代城市公园萌生与演化的历史进程、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文化内涵、多重功能及其象征意义。这些学术成果既显示至今为止围绕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解读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显示了这一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故此,本文拟在检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进一步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及其空间所在。

一、空间观的引入与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

毋庸置疑,人类的一切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因此,也便深深留下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印记。尽管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领军人物在城市研究中,就把研究视角投向城市空间,并创立了著名的同心圆理论^①,然而,或许由于受线性发展史观和“以史为鉴”史学传统的影响,以往我国的历史学更多关注人类活动时序性的变迁,而鲜于探究它的空间特征,以及两者间的联系。拜现代学科交叉、渗透发展之赐,历史学在不断引入其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学科发展趋势中,得以不断加强对人类活动空间维度的认知和重视。我国学术界城市史研究的学术历程,似乎也不例外。我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在中国现代化的大

收稿日期: 2011-03-15

① 参见周晓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4期。

背景下,注重于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探究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直到90年代中叶,城市史的研究才把目光投向城市空间,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公共空间也顺势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公共空间是一个与私人空间相对应的概念。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它一般指产权归属公众,向社会各阶层的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等——开放的物理空间^①,如城市街道、广场、公园、运动场等,即为城市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则指产权归属私人,仅为私人享用的物理空间,如私人住宅、私人园林等等。另有一类产权归属私人,却向公众开放的物理空间,称半公共空间(semi-public space),如城市的戏院、茶馆、商场等等^②。其中,城市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③,作为来自西方的跨文化移植,具有特殊的外形和内涵,因而格外引人瞩目。是故,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研究者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化学以及建筑学等多种学科背景,其兴趣点和考量点各异,观察的视角、运用的理论与方法不同,由此产生多种多样的解读。

最先引入公共空间概念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是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1993年,留学美国的史明正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北京转型:20世纪早期的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Beijing Transforms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两年后,修订后的博士论文被译成中文出版^④。这是一本探讨20世纪前30年,北京各项市政建设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城市史研究新作。题为“公共空间”的该书第四章,即以20世纪早期北京的公园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公园兴建的经历及其对北京市民生活,尤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饶有兴趣的是,作者在本章的结论中表明,他对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源自于美国汉学界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解读和运用^⑤。与玛丽·兰金和罗威廉通过研究浙江、汉口的地方社会精英及其社会组织的活动,解读晚清至民初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拓展不同,史明正力图通过对20世纪早期北京的公园这一城市新兴公共空间——史明正称其为公共领域的地域方面^⑥——的研究,解读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拓展及其特点。作者得出如下结论:从北京私人 and 皇家园林、庙宇转变为公园的进程,可以看到帝王领域的收缩和公共领域的发展;但不能把公共领域的扩展归因于正式国家权威之作用的削弱,政府和当地绅商在北京的公园运动中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⑦。

众所周知,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以及相关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否适用于观察和分析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⑧。对此,本文由于主题和篇幅所限,无意展开讨论。然而,就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而言,我们有如下思考。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意,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身理解具体表现为公共舆论领域;公共舆论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从事的批判活动;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之中坚力量的公众^⑨。据此,当我们将近代城市公园这样一种新型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理论相勾连时^⑩,我们

① 人们有时也在抽象、借喻的意义上使用“空间”这个词,如赢利空间、谈判空间、舆论空间等等。公共空间亦作如是观。本文讨论的城市公共空间,仅在物理空间意义上使用。

② 参见“The Free Encyclopedia”, Encyclopædia 词条:“Public Space”;另可参见王笛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中所引P.杜理斯(Perry Duis)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分类(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以及李德英在《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中所引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的分类。

③ 按照上述分类,本文讨论的近代上海私园开放应属半公共空间,开放后的私园具有公园的一般功能,似可称为“类公园”。故本文将其视为公园讨论。

④ 参见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迁》中文版前言,王业龙、周卫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⑦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迁》,第156-158页。

⑥ 在1988年发表的文章中,史明正改称公共空间为公共领域的空间与物理形态。参见史明正《从皇家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88年第3期(Vol 24 No 3, Jul 1998, pp. 219-254)。

⑧ 有关讨论可参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⑨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转引自曹卫东选译《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8页。

⑩ 近年来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混淆“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这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值得注意。

必须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城市公园是否能按史明正所称成为公共领域的空间和物理形态,取决于城市公园是否成为公众表达公共舆论、批判公众事务的场所。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把发生于公园内的一切政治性活动均视为公共舆论的表达,更毋庸说不能把一些社团利用公园场地开展的讨论团体内部事务的活动视为公共舆论。对此还是需要有更详细、深入的探索。第二,如若近代城市公园曾经成为公众表达公共舆论的空间,那么当我们横向比较公园在其发源地欧洲的情况,纵向比较公园在当今中国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引出如下的结论:城市公园,由此推及城市公共空间,是否能成为公众表达公共舆论的空间,取决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不是取决于它自身。因此,我们对近代城市公园演化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应当有更充分的认知。

二、私园开放:对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

1996年,熊月之发表了《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一文。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国内学者最早以公共空间视角讨论近代城市公园的力作。张园系晚清上海私家花园开辟为公众活动场所的一个典型案例。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张园从一个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转型的轨迹,以及作为一个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转型后的张园所展示的种种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公共活动场景,尤其是凸显其社会政治功能的上海各界集会与演说;探析了促成张园私园公用转型的时代背景和地方性社会特征,以张园转型为代表的这一城市空间的本质性变迁带来的社会影响与效应,以及转型后张园这类新型城市公共空间所蕴涵的独特的社会文化信息。一篇论文自然不可能触及近代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所有内容。但熊月之的力作却已经为近代城市公园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考量,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重要平台^①。

作为近代城市新型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最先是私园公用的形态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已有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公园的开辟大致可分为三种途径和类型:即(1)由租界工部局(或公董局)主持兴建的租界公园;(2)私家园林的开放;(3)由地方当局主持,或地方精英集资兴建的公园。这三者构成近代城市公园萌生、发育和成长的三个基本阶段,虽然其间也有部分的交叉和重叠^②。

我国第一座城市公园为上海租界的外滩公园。它系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866年利用洋泾浜中挖起的泥土填平沙滩建造而成。于1868年8月8日正式开放。英文名称为“Public Garden”^③。其后,在天津英租界,1887年6月21日,即英皇诞辰50周年之日,有维多利亚花园(又称“英国花园”)正式开放,是为天津的第一座公园^④。此后,在清末和民国的数十年间,仅在上海、天津和青岛等大城市,就有三十余座租界公园开辟,从而构成近代中国城市公园的租界公园系列^⑤。由此观之,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近代城市公园实为西方公园文化跨文化移植的产物,为近代西学东渐之一部分。这为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讨论空间,容后详述。

在第一座城市公园在上海外滩兴建10余年后,即19世纪80年代后,同样是在上海,徐园、

① 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② 李德英最先尝试对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类型和演化历程作出划分(参见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但其中可商榷之处有三:第一,在李德英划分的三类城市公园中,将皇家园林的开放与私家园林的开放并列为第二类,似乎不妥。理由是,一者民国以后将原皇家园林以及祭坛等改造为公园系民国政府所为,应列入第三类,作为其属下的一小类;清末唯一由清政府自行开放的“万牲园”系一动物园,与公园尚有区别。既便视同公园,亦可归入私园开放,因皇家就是最大的私家。第二,第三类公园不仅有政府主持兴建的(占大多数),尚有地方精英自行集资兴建的,与政府无涉。第三,应考虑三种类型演化的时间,及其所代表的三个发展阶段的交叉性。如私园开放并非止于清朝灭亡,第三类亦不应始于民国。

③ 李德英称英文原名为 Public Park(参见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何者为确,待查。

④ 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卷第1期(2003年3月)。

⑤ 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

张园、愚园、西园等一批私家园林相继向公众开放,成为城市公园,或类公园的公共空间^①。民国以降,江苏省内亦有无锡梅园、南通啬园等一批私家园林向民众开放^②。由此构成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一个特殊系列——私园公用系列。

园林的营造,中国古已有之,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然而,在近代城市公园出现之前,这些园林或为官家所据,或为私家独享。尽管部分私家园林在一年的个别特定日子会向特定的外人群体开放,但并非向公众开放的公共空间。始自晚清上海的私园开放公用,其主要动因之一显然来自租界公园兴建的示范与刺激^③。而另一方面,私园公用又为始自20世纪初,由地方当局主导的公园建设运动提供了一种示范与刺激。在此意义上,有学者称其为近代城市公园的过渡形态^④。

20世纪初,即距第一个城市公园兴建30余年,第一个上海私园向公众开放20余年,兴建公园开始为地方官绅和官府所关注^⑤。近代中国的公园建设运动就此起步。进入民国后,地方当局相继将兴建城市公园纳入市政建设规划,公园建设在全国渐次铺开,并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高潮。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公园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的急速扩展。由此为我们留下许许多多值得深入探寻的学术空间。前述史明正对这一时期北京的公园建设的研究,即为生动的案例。

三、研究的拓展:对城市公园的多种解读

史明正和熊月之对近代城市公园这一新型公共空间的探讨,似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和迅速回应。1998年,两位开拓者又分别在中美两地发表文章:即史明正的《从皇家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早期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⑥,形成唱和之势。

熊月之的续文,正如其文章题目所提示的,从两年前对一个公共空间的探讨扩展到对一批,也是同一类型公共空间的探讨,由此揭示晚清上海新型公共空间的拓展。作者力图向我们展示晚清上海私园开放所呈现的更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但纵览全文,张园依然为其首要;对其它私园开放情况的描述则略显粗放。不过,文章的点睛之处在于以“中西文化的并存与混合”为标题的第3节。在这里,作者集中讨论他在《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一文中已经提出的若干重要思考命题,意在揭示晚清上海私园开放这一新型公共空间背后潜藏的社会实在和文化内涵。

晚清上海的私园开放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租界公园兴建的示范与刺激^⑦,但由此产生的公共空间只具有物理空间的意义。这一公共空间能演化成集休闲活动空间、社会活动空间和政治活动空间于一体,是与晚清上海华洋社会空间分异、并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息息相关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空间结构,使得“租界缝隙效应”得于形成,使得并存的中西两种公共活动空间、两种文化得于交染、混合^⑧。因此,用熊月之的话来说:“张园这类私园公用情况的出现,是中西

① 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② 胡其舫:《江苏近代公园概貌及其意义和影响》,《中国园林》1999年第6期。

③ 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④ 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

⑤ 对此,阎杰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较详细叙述(第532-533页),可参阅。

⑥ 史明正:《从皇家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88年第3期(Vol 24 No 3, Jul 1998, pp. 219-254);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⑦ 参见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⑧ 参见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两种公共活动空间形式的混合产物,也是两种文化并存的产物”^①。

史明正的文章则在上述《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迁》一书第四章的基础上,对20世纪早期北京皇家园林(包括祭祀场所)被改造、开放为城市公共空间——公园的经历和影响,作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作者再次表达他的研究意图:介入学术界关于公共领域以及国家—社会关系问题的讨论。依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文章从两个重要方面提出对公共领域的不同解读:一是剖析作为公共领域空间和物理形态的公共空间(即公园),一是考量政府与地方精英在北京公园建设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并由此得出与前文所述相似的结论,只是在概念的表达上更为谨慎^②。

显而易见,虽然史明正和熊月之的文章在考察对象和内容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前者以20世纪初北京皇家园林被改造、开放为公共空间(大众公园)为个案,后者以晚清上海私家园林的开放为公共空间(公用私园)为个案;两者都关注近代城市公园这种新型公共空间形成的过程、促成的因素及其具有的多重功能,尤其是政治功能。但是,两者关注的重点、运用的话语,以及蕴涵的问题意识,显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

就近代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城市公园的研究而言,1998年似乎是一个时间界标。此后,相关的文章逐渐增多,研究者的队伍也逐渐扩大。研究者视野中的近代城市公园,不仅地域上从上海、北京两地扩展到成都、广州、厦门以及江苏省等地,时间上从晚清民初扩展到民国中后期,而且在类别上,也覆盖了近代城市公园的几乎所有类型^③。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近代城市公园的认知。其中部分研究者的探索,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他们提供了考察近代城市公园的新视角,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000年,李德英发表了《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④一文,开始显露她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与兴趣。文中对公园涵义的诠释、对近代城市公园发展阶段和公园类型的划分,尽管还比较粗略,且有值得商榷之处^⑤,但已显示出作者在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前较充分的知识准备。文中以成都公园为例所阐述的城市公园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影响,初显作者占有地方性史料资源的优势,预示着作者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新的研究成果。时隔三年,我们终于读到她的新作——《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公园为例》^⑥。

就社会史研究而言,社会冲突并非新鲜的议题。但是,当作者将社会冲突的场域置于城市新型公共空间——城市公园时,她显然提出了一个此前研究城市公园的文章尚未给予关注的命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命题的提出,提示我们应当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性作更细致深入的考量。

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都必然产生社会冲突,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使得社会各色群体都可以随意进入,因此潜藏着更多社会冲突的可能性。李德英的文章考察了城市公园里的两类社会冲突:政府管理和平民生计的冲突;以公园为舞台的社会冲突。就公园而言,这两类社会冲突有着

① 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② 史明正:《从皇家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88年第3期(Vol 24 No 3, Jul 1998, pp. 219-254)。特别关注其引言和结论。

③ 除下文所涉及的文章外,1998年以后发表的相关文章尚有:赵可:《少城公园的辟设与近代成都》,《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胡其航:《江苏近代公园概貌及其意义和影响》,《中国园林》1999年第6期;陈晶晶:《近代广州城市活动的公共场所——公园》,《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卷第1期(2003年3月);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戴海斌:《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刘庭凤:《民国园林特征》,《建筑》2005年第2期;胡冬香:《浅析中国近代园林的公园转型》,《商场现代化》2006年1月(上旬刊);周晓东:《略论中国近代公园的政治功用》,《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

④ 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

⑤ 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⑥ 李德英:《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公园为例》,《史林》2003年第1期。

不同的含义:前者是一种内生性的社会冲突,因为冲突起因于公园自身的问题;后者则是一种外生性的社会冲突,因为引发冲突的原因在公园外部,公园只是表现这种冲突的场所^①。

从时间上看,陈蕴茜是较晚关注城市公园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位研究者。但她出手不凡,接连发表了三篇较有分量的文章。2005年,她发表了《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②一文,把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这一贯穿近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之一,置放于跨文化移植的新型城市公共空间——公园内的大众日常生活场域,构成一幅极其独特、耐人寻味的历史画面。

陈蕴茜首先运用空间殖民主义理论,从租界公园的空间构成、布局,园内建筑体的样式、风格和命名,及其显示的象征意义,揭示租界公园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进而阐述了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殖民主义者歧视华人象征符号的中国民众集体记忆形成的历史语境及其影响,即民族主义意识的燃点和喷发。作为其结果,便是民国时期兴建的城市公园,成为“传输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观念,塑造着新型国民”,借以对抗殖民主义透过空间表达的文化霸权。这种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透过公园这一城市公共空间表达的张力,在陈蕴茜的笔下可以说已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城市公园最先出现在上海租界,是西方公园文化跨文化移植的产物。这一跨文化移植的供给方为在华殖民主义者,因此不可避免地给租界公园这一新型城市公共空间涂上殖民主义色彩。揭示近代中国城市租界公园的这一殖民主义空间色彩,有助于我们对租界公园的深入认知。不过,我们仍然应当清楚认识到,这仅仅是租界公园的一面。近代租界公园对近代中国城市新型公共空间形成的开创和示范作用,以及在中西文化传播、交流中的桥梁作用,都是应当给以关注和积极评价的。或许,借助于“空间殖民主义”和“中西文化交流”两种视角,我们可以更全面、完整地认知近代中国的租界公园。

沿着“空间是权利运作的基础”这一福柯具有后现代主义批判色彩的思辨路径,陈蕴茜于2006年发表了《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这是一篇视角独特的力作,也是前述《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一文的姊妹篇^③。作者凭借丰富的史料、扎实的理论 and 敏锐的观察,对民国时期公园建设运动中的中山公园现象做了丝丝入扣的解读,从空间与象征的维度,深入剖析了中山公园如何成为国民政府推行孙中山崇拜空间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成为新兴民族国家透过空间重组对民众进行控制影响的重要权力场域,以及这一权力渗透场域对民众日常生活、社会记忆的影响。其论证逻辑条理清晰,富有说服力^④。

确如陈蕴茜文中所言:至今尚无学者对全国中山公园建设运动作全面研究。而陈蕴茜的文章限于篇幅,自然也无从容纳这一足以建构一部专著的丰富内容。就此,笔者提出两个由该文触发的问题。

第一,从作者广泛收集史料提供的“全国中山公园表(1925-1949)”观之,中山公园确实许多地区广为兴建(包括更名而成)。但其地域分布却显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南多北少,差异甚大。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或许在对这一突出现象的解读中,我们会对民国时期的中山公园建设运动,进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区域性特征,获取更多的认知。

第二,据作者的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各地至少有267个中山公园,其数量颇大。但与

①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王笛也关注成都街头这一城市公共空间发生的种种冲突。其视野更为开阔,值得借鉴。参见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③ 事实上,陈蕴茜在该文第三节的最后一部分,已经对近代中国公园建设运动中的中山公园现象做了简要论述。参见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④ 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

此同时,全国各地尚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其它公园(暂且不计租界公园)。虽然手头没有全国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城市的统计数据加以推论。据陈晶晶对1934年广州公园的统计,其时该市除中山公园外,尚有8个其它公园^①。另据李德英对20世纪30年代成都公园的统计,其时除中山公园外,尚有6个其它公园^②。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其一,中山公园与同地其它公园关系如何?其结果和影响如何?其二,政府的权力是否(或如何)向其它公园渗透?其运作形式与中山公园有何异同?后面一个问题在部分文章对公园教化功能的论述中已有所触及。但从民族国家建构和权力渗透公共空间的角度入手,似乎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四、今后的发展空间:广度与深度,实证与理论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学术界在近代中国城市公园的研究上已经取得可喜成果,但有待进一步开拓的研究空间依然甚大:不仅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其深度也有待进一步开掘。对此,除了上文随论述的展开中已经提及的建议外,笔者还有如下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愿将其置放于学术公共空间,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

其一,空间视野下的公园。我们可以排列出公园空间属性的如下序列:空间——城市空间(对应的是乡村空间)——城市公共空间(还有城市社会空间、城市物质空间、城市经济空间等等)——城市公园(还有街道、广场、市场、戏院、茶馆等等)。上述序列可以触发我们许多研究的灵感。比如,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的一种类型,使得我们可以探讨城市公园的布局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关系。又如,城市公园并非唯一的一种城市公共空间。以比较史学的方法,对不同城市公共空间加以比较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也极富学术价值的命题。就拿公园与茶馆的比较研究来说,茶馆是一种传统的公共空间,公园则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然而,近十余年来几乎与公园研究齐头并进的茶馆研究表明,两者在超越休闲娱乐这一预设的原始功能,演化为集多元化功能为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方面,具有诸多的类似之处。同时,两者在空间特征、规模,运作方式和制度设计,以及在民众观念中的映象等等诸多方面又有不少差异^③。更为有趣的是,在近代许多城市公园里,均开设茶馆。这一新旧两种公共空间混合的局面,发人深思。

其二,对人的关注与公园研究。时常听到有人批评我们的史学研究忽视了历史的主体——人!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是提供民众进行各种活动的公共场所,本应是最富有人色彩的领域。在这里,不同年龄、性别、阶层、职业的民众,或欣赏景观,或锻炼身体,或参加集会,或饮茶闲谈,构成各式各样的画面,充满人气。对此,熊月之笔下的张园,就有栩栩如生的描述^④。但至今仍有两类与公园建设密切相关的人物——公园建设的倡议者和设计者,尚未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由此推而广之,我们应当有思想史视野下的公园研究。即应当探讨从晚清到民国,各种社会群体及其代表人物如何看待公园。我们姑且称其为“民众的公园观”。空间是最富于意识形态色彩的。民众公园观的研究不仅是研究近代跨文化移植的西方公园文化本土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体系,而且是我们认知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变迁的一面有效的镜子。若将民众公园观与政府的公园观,或西人公园观对照,我们或许还会有意外的收获。

其三,公园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变迁。城市公园素有“城市肺腑”之美誉。这无疑表明城市

① 参见陈晶晶《近代广州城市活动的公共场所——公园》,《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科版)2000年第3期。

② 参见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

③ 关于茶馆的研究,可参阅倪群《近代上海的茶馆》,《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王笛《街头文化:晚清成都公共空间与城市平民》(Street Culture: 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mers in Late Qing Chengdu),《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88年第1期(Vol 24 No 1, January 1998, pp. 34-72);《二十世纪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刘风云《清代的茶馆及其社会化的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牛力《试论近代中国茶馆的社会功能》,《东方论坛》2002年第3期;潮龙起《近代帮会的茶馆与茶文化》,《历史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参见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公园对城市生态环境影响甚大。欧洲公园建设运动的元动力就在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近代中国公园建设运动的兴起,其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动因,同样出自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尽管近代中国城市公园具有多元化的功能,但我们在关注公园的其它功能时——至今最受关注的当属社会与政治功能——不应当忽视其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功能。故此,我们应当有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公园研究:探讨城市公园建设与城市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广义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前者与城市空气的净化相联系;后者则与健康的休闲娱乐生活相联系。两者都指向市民的身心健康。

其四,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就城市公园的个体研究而言,与近代中国兴建的数百个城市公园相比,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仅涉及其中甚少之一部分。我们需要有更多高质量的个体公园研究。城市公园群体研究包括区域群体研究和类型群体研究。前者如对成都公园、广州公园的研究;后者如对租界公园、中山公园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亦可看到综合两者的区域性类型群体的研究,如熊月之对上海私园公用的研究。无论何种群体研究,目前都面临进一步开拓的局面。比如前文提及的对近代城市私园开放的研究,至今除熊月之对上海的深入研究外,其它城市尚未见有专文问世。私园开放是近代中国园林转型的重要标志,其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均有待更多的认知。又比如对于租界公园的研究,除了前文提及的陈蕴茜从空间殖民主义所作的考察和杨乐等人的《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①一文外,至今未见对租界公园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再如前文提及的,发生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公园建设运动,至今亦未见专文研究。

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两者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我们既反对没有实证依据的空洞理论,也反对没有理论支撑的白描实证。事实上,一篇上乘的学术论文,总是实证与理论的完满结合,就如前文讨论的几篇佳作所显示的。但就至今为止城市公园研究的状况观之——整体城市空间研究亦作如是观——理论探索方面似乎稍显薄弱。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曾指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在其中,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比较不是随时间展开的长远生命,而是一种连接各点,并且与自身的经纬相互交错的网络”^②。因此,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来自历史经验的思考。为此,我们不仅需要有大胆探索的勇气和胆识,还需要积极汲取来自社会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和城市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素养。唯此,我们能寄希望于未来的突破性研究。

(责任编辑:陈炜祺)

A Multianalysis on the Space of City in Modern China: Focus on Park of City

Dai Yifeng

Abstract As a new style of public space in modern Chinese cities, park has attracted a lot of scholars who have published some works. These scholars showed us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parks in cities and their influence. They also try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meaning, multiple functions and symbol of park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theories. These works show us the depth and extent of research until now, 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point out some route for a deepening research.

Keywords Modern China Park in City Route of Research

① 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②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陈志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